

2012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新中国第一次普选运动与“国家主人翁”  
形象建构——以上海为例，兼及北京  
**CONSTRUCTING THE DISCOURSE OF  
“MASTERS OF THE COUNTRY” IN NEW  
CHINA’S FIRST GENERAL ELECTION:  
SHANGHAI AND BEIJING COMPARED**

Zhang Jishun |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新中国第一次普选运动与“国家主人翁”形象建构  
——以上海为例，兼及北京

**Constructing the Discourse of “Masters of the Country” in New China’s First  
General Election: Shanghai and Beijing Compared**

张济顺  
Zhang Jishun

**Abstrac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1953-54 general elections for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was an important moment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CP) articulation of the slogan “masters of the country [*guojia zhurenweng* 国家主人翁]” as a powerful discursive structure. The language and imagery associated with this ideological construct was used to inspire loyalty toward the party and the nation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n cities, as well as to expand and solidify the new regime’s political base in urban societ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historical origins and significance of “masters of the country” rhetoric for grassroots society in Shanghai and compares the operation of this concept in Shanghai with examples drawn from the elections in Beijing. At the heart of this comparison is the tension between this discursive structure as a slogan designed to change the affective or emotional state of voters and the actuality of how power was distributed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 新中国第一次普选运动与“国家主人翁”形象建构 ——以上海为例，兼及北京

张济顺

Zhang Jishun

1953-1954 年第一次普选常常被书写成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随着大量历史档案的开放发掘，类似的书写受到质疑。通过对普选运动中上海底层社会的研究，我获得以下的结论：

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普选是在法律制度的形式下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动员，是中共阶级革命的继续，不是宪政的开端，无论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还是被确认为“依靠对象”的底层“劳动人民”，都未能经过普选和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确立起现代法律框架内的权力关系。

其二，尽管中共举办了中国宪政史上第一次最大范围的公民选举，尽管为数不少的如上海里弄干部的底层小人物当上人民代表，但普选还是一次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民众只是这场运动的行动主体，而非权力主体。

但是，上述结论还不是新中国第一次普选的全部意义。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去探讨，可以发现普选运动同时是中共以权力话语建构“国家主人翁”形象的一个重要时刻，用于激发都市底层社会对党和国家的热忱和忠诚，以扩展和巩固新政权在都市社会的政治基础。“国家主人翁”也向底层社会隐喻改变命运的可能性，都市社会的各类群体利用普选的舞台，竞相表演，争当主人。

本文将普选中的上海底层社会置于“当家作主”的历史场景中，同时参照北京的若干案例，展示“国家主人翁”的各个面相。这一幕幕由党、国家和社会共同演绎的奇观，常常是政治与社会场域中的虚幻，却是感觉世界的真实。

## 宣传：何谓主人翁？

作为政治宣传和口号，“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之鼓动，早在中共根据地和解放区

的革命运动和社会改造中就普遍运用。而“主人翁”的概念与国家政权建设发生法律意义上的关联，肇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次普选。

建国伊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sup>1</sup>。1953年的第一部《选举法》规定：“凡年满18周岁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年限，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之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之”<sup>2</sup>。这两个具有开国奠基意义的法律文本显示，广大中国公民具有参与政治，选择自己代言人的民主权利；经普选产生的人民代表则是各级权力机关的主体。选民和代表理所当然“国家主人翁”。

然而，这只是由法理逻辑而得的结论。事实上，“国家主人翁”仍是中国共产党阶级革命理论的产物，是发动民众投入普选的一种话语策略，一如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政治动员。

还在普选准备阶段，上海市委、市政府就根据中央的统一口径，拟定了普选动员报告和各项宣传计划。“当家作主”、“主人翁”和“主人翁精神”是这类报告和计划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以此为标题的宣传品也大量问世。在市委宣传部制定的“关于普选运动的报导计划要点”的宏观指导下，市选举委员会（以下简称：“选委会”）编印的各种宣传讲话材料下发至各区，要求以统一的口径对选民宣讲“我们的选举制度是真正民主的选举制度”、“严肃地讨论和鉴别代表候选人”、“认真严肃地提出代表候选人”以及“庄严地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利，积极参加选举大会”等内容，贯穿其中的主题思想就是“以主人翁精神搞好普选”<sup>3</sup>。考虑到很多底层选民文化程度低下甚至是文盲，这些内容又被宣传媒体转化为“选好人，当好家”、“当家作主喜洋洋”等形象语汇。各报社、剧团和出版社也纷纷刊登报导、编写上演或出版制作相关的应景之作，一时间，宣传画、连环画、小故事书、幻灯、越剧、沪剧、话剧、相声、说唱等等，都为“当家作主”的普选内容所充满。

---

<sup>1</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页。

<sup>2</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1953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1953年3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4-25页。

<sup>3</sup> 上海市选举委员会（以下简称：“选委会”）宣传处编印的普选宣传材料，1953年9月。上海档案馆：全宗号B52（市选举委员会档案），目录号2，案卷号33（以下缩写格式：B52-2-33）。

1953 年秋，上海市普选工作全面推开后，普选的宣传动员由概念的“当家作主”演绎为一个个鲜活的国家主人翁事迹。各区选委会向上报告的广大群众“当家作主”的精神风貌和生动事迹不胜枚举，各种报刊、广播也大密集地进行报道。直到 1959 年，上海市委宣传部为新中国 10 周年大庆举办征文活动，6 年前《解放日报》刊载的《一个普通农妇的选票》一文仍入选《上海解放十年》一书<sup>4</sup>，足见普选运动中的“主人翁”故事已载入中共辉煌 10 年的史册，成为上海新社会的一个标识。

但是，能够进入官方宣传媒体，扮演“主人翁”角色，上演“当家作主”连台戏的，既不是整体意义的选民，更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公民，而是中共依据其阶级理论和意识形态，经宣传部门精心策划和挑选的三种人：工人为主的劳动人民、苦大仇深的底层妇女以及曾遭受歧视的少数民族。

最具权威的《解放日报》在“人民在普选运动中”专栏下刊登的报道可见“主人翁”面貌之一斑。仅普选第一阶段近两个月内，这一专栏里刊登的关于上海公布选民榜和发放选民证的报道就近 40 篇，其中 80% 来自工厂，其余的来自里弄，妇女们的事迹又占据了很大篇幅。<sup>5</sup> 只有“普选简讯”才登载来自科学院和大学的聊聊数语的“豆腐干新闻”<sup>6</sup>。

这些报道中的“主人翁”尽管都有真名实姓，身处时空各不相同，但他们故事的话语套路却如出一辙。

循着新旧对比的思路，被当作宣传典型的所有“主人翁”都会道出自己的翻身感恩之情——

一篇报道记叙了在儿时被法国炮车压断了一条腿的青年工人王凤桥积极参加普选“当家作主”的感受。他说：“政权就是命根子，从前，反动派掌握政权，我们是牛马，……自己的性命也抓在人家手里；如今，人民掌握了政权，你看我们劳动人民的生活，越过越幸福，我这个一条腿的人也变成两条腿了”。“普选是由人民自己选举代表管理国家大事，这不是别人的事，是我自己的事”。<sup>7</sup>

又一篇题为“哪能可以不忙些呢”的报道讲述的是一个叫张丽卿的军属，为普选不辞辛劳积极工作的事迹。记者问及为何如此奔忙，她答：“反动派时期的‘大选’，

---

<sup>4</sup> “上海解放十年征文编辑委员会”：《上海解放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年，第 146-153。

<sup>5</sup> 见《解放日报》1953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20 日。

<sup>6</sup> 见《解放日报》1953 年 11 月 21 日、12 月 1 日。

<sup>7</sup> “政权就是命根子”，《解放日报》1953 年 11 月 10 日。

伪联保办事处的人，无耻地连夜为反动头子潘公展拉票。老百姓在反动派的天下，连生活和生命都没有保障，还谈什么‘选举自由’！”“从前像我这样的老太婆是被人家看不起的，现在，我们女人家也好参加选举了”，“比比过去，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道！”<sup>8</sup>

两篇反映回族选民心情的文章写道：“在反动派散布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影响下，少数民族到处受歧视、受排挤。”李寿彭说，40年来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回族。在外面吃饭，别人请吃猪肉，“只好说我是个胎里素”。当话题转到新社会，谈到《选举法》，李“越谈越兴奋”：“祖国对我们少数民族的照顾是多么周到。比起我的祖父、父亲来，我真是太幸福了。……我的母亲今年83岁了，她也欢天喜地说‘没有毛主席哪有今天。’她这话正是我们家里人的心里话”。<sup>9</sup>

还有一篇来自申新九厂的报道更具回忆对比的强烈现场感：“从第三道铁门到第一道铁门，灯火辉煌，人声欢腾，六块披红挂彩，连接起来有十多丈的选民榜上，排列着六千多公民的名字”。“就是在同一块地方，五、六年前的二月头里，曾经展开过一场人和兽的搏斗，……今天，聚集在这里的成千成百的工人，正是当年以砖瓦以肉身阻拦国民党反动派的装甲车的人们，正是当年担任纠察队员的英雄的人们……一个女工说：‘二二’斗争时，是反动派来捉我们，杀我们；而今天，是我们的光荣的名字公布在这里。我们永远成了新中国的主人了”。<sup>10</sup>

按照以“实际行动”体现“当家作主”的思路，报道中所有的“主人翁”都会将身边小事拔高为普选和贯彻国家总路线的大事——

国棉六厂女工姜小妹对记者说：“普选运动以前，我每天要出8、9只坏纱，我们厂展开普选运动以后，9月份我只出了4只坏纱；10月份以来，只出了1只坏纱”，“坏纱是我们生产上的敌人，要打倒它。我知道，减少坏纱，就是当家作主的具体表现”。她的口述文章见诸报端时，被记者加上了“普选教育我要搞好生产”的醒目标题。<sup>11</sup>

上海丝绸厂女工莫巧云谈到选民榜对她的激励。她原本想参加厂里生产技术攻关任务，但又顾忌别人说闲话，颇为犹豫。当看到自己名字上了大红选民榜，“就有

---

<sup>8</sup> 《解放日报》1953年10月27日。

<sup>9</sup> “回民马安泰的兴奋”、“一个回族人的喜悦”，《解放日报》1953年10月29日、11月17日。

<sup>10</sup> “我们永远成了新中国的主人”，《解放日报》1953年12月17日。

<sup>11</sup> 《解放日报》1953年11月25日。

一种说不出的快乐滋味”，“心里就有了底”：“我是主人，应该想法开车换筒，提高产量。只要我做的是对的，何必怕人家说我呢？”心头疙瘩解开了，她大胆试验，终于攻下难题。<sup>12</sup>

中国内衣厂扫地工张金南原为自己能“认真做生活（上海话，意为“认真干工作”——引者注）而感到满足，听了几次普选报告，参加小组讨论后，心想：“我虽然是扫地工，但我也一样是主人，……更何况我是工人阶级！”他开动脑筋，把积压仓库的皮拉索改制成有用的皮仁，节省了几千万元（大面值人民币，1万元相当于现在人民币1元）。<sup>13</sup>

杨树浦路崇益里64岁的阿毛婆婆“抚摸着选民证”，激动地表态：“我想，当家人就得像当家人的样子。我的儿子媳妇在工厂里做工，我也要在家带好小囡，按时喂奶粉，洗尿布，好让儿子媳妇安心生产，多给国家生产布，生产纱，好让我们的日脚（上海话，意为“日子”——引者注）一天比一天过得好”。<sup>14</sup>

除了文字报道外，记者们还捕捉了许多“当家作主”的瞬间，《解放日报》等重要宣传喉舌不时地予以刊登，向人们展示“主人翁”的风采。



- 12 “身
- 13 “托
- 14 “阿

与文字报道一样，照片上的“主人翁”也都是“工人阶级”，尤其是那些笑容灿烂的工人姐妹们。

通过宣传机器的强力运作，普选的领导者希望这些典型的言语和形象能够首先在底层劳动群众中引起共鸣，以积极参选的行动，来体现对共产党、新中国的热爱与忠诚。扩而言之，他们希望通过“当家作主”的宣传，使得普选全过程成为“提高人民政治积极性和国家主人翁感觉的过程”，从而彰显“我国民主制度的广泛性和真实性”<sup>15</sup>。

### 表演：感受主人翁

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国家主人翁”的宣传是很有针对性的。首先需要解决的是选民的积极性和参与度的问题，尤其是在普选前期。

来自上海基层选区的信息并不乐观，对普选的漠视和曲解在许多内部报告中反映出来。上海市中心城区黄浦区的报告说：“有些人开始把普选当做‘浦东’‘浦西’（上海话“普选”的发音与“浦西”完全相同——引者注）；听到了‘候选人’以为还有‘先选人’”<sup>16</sup>。还有的里弄干部竟将“等额选举”解释为“80人开会，40人

---

<sup>15</sup> 解放日报政治组：“关于普选运动的报道”，原文无具体日期。上档 B52-2-32。

<sup>16</sup> 上海市黄浦区选委会办公室：“刘秘书长在本区第 19 选区的选举动员报告稿”，1954 年 1 月 13 日。上档 B52-1-24。



选举，40人等候选举”<sup>17</sup>。部分先行选区讨论候选人或选举中出现了上级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如，在讨论提名原则时，一个有26个选民的小组，第一次只来了3人，第二次来了6人，只得与其他小组合并讨论。“开会时除了个别积极分子外，其余选民皆未发言。”<sup>18</sup>

“国家主人翁”宣传的另一个针对性，是解决选民对党和政府的普选方针、步骤的服从与契合的问题。

候选人的联合提名和等额选举是中共掌控选举的两个关键环节<sup>19</sup>。而上海基层选民的不解和不满恰恰在此。1953年底提名阶段刚刚开始，市选委会就收到各区的报告，大量反映基层选民特别是里弄居民的意见。

市妇联宣教部的报告称，北四川路、普陀、常熟等3区里弄选民小组提意见说：“联合提名等于包办”，“既然上面确定了，就不要我们讨论了”，“好像群众只有选举权，没有被选举权”。有些“积极”的意见中也带有一定的牢骚：“反正由共产党提出来的，我们相信它，有什么好讨论的呢？”<sup>20</sup>

在市选委会汇总上报市委的“拥护联合提名和等额选举”的“正面情况”中，汇报的也多是底层选民的“认识转变过程”，先前的许多“错误看法”和“糊涂思想”被一一罗列其中。诸如，“联合提名不民主，按级产生代表才是民主”，“上面搞好了，啥民主，共产党，是宣传一套”；“候选人是上头提名的，在国民党时期也选过，我们要选的选不着，不要选的一定要我们选”，联合提名提出的人是“叫花子吃死蟹，只只好”；“5个候选人选5个没有‘拣头’”等选民言论<sup>21</sup>，已经不是在个别选民小组会上才听得到。

群众情绪的消极和抵触，甚至导致了某些试点或先行选区选举结果与领导机关事先酝酿内定及联合提名的人选大相径庭。如一个先行选区有3名候选人，都因得票低于半数而落选。<sup>22</sup>

---

<sup>17</sup> 市选委会办公室：《普选情况》，第20期，1954年1月6日。上档B52-1-40。

<sup>18</sup> 《普选情况》，第20期。

<sup>19</sup> 有关联合提名和等额选举的法律规定，参见《选举法》第7章，第47条和《上海市基层选举实施细则》第5章，第17、18、29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34页；上档B52-1-9。

<sup>20</sup> 市妇联宣教部：《情况反映》，第11期，沪妇宣(53)字第318号，1953年12月28日。上档C31-2-205。

<sup>21</sup> 市选委会：“关于群众对联合提名的反映情况的材料”、“关于人民对选举的光荣感、胜利感、责任感看法”。上档B52-2-12。市选委会：《普选情况反映》，第3号，1953年5月29日。上档B52-1-39。郊区选委会办公室：“群众对联合提名、等额选举一些好的反映”，1954年1月7日。上档B52-2-29。市选委会：《普选情况》，第20期。

<sup>22</sup> 《普选情况》，第20期。

出自底层百姓的消极言论和抵触情绪以及基层干部的不佳表现，并不出中共领导预料，因为在此前多次政治运动中也有类似情况。但普选毕竟与以往的运动不同，有诸多要素不能绕过这些普通人。联合提名之后要“几下几上”，选民小组的讨论是法定程序，每个选民都有一票，即便是等额选举，参选率和得票率也大有讲究，而这些都与基层选民对上认同与否紧密相关，任何环节失控，人民民主的“普遍性”、“真实性”就要大打折扣。因此，转变选民和干部的态度，形成踊跃参选和紧跟党和政府的舆论氛围及监控机制，阻止那些“领导不力，选民消极，选举失败”的情况蔓延，就显得尤为必要。

运用一切手段进行声势浩大的宣传，是中共驾轻就熟的教育基层选民的方式。“国家主人翁”的话语便是其中的主旋律。针对群众的“思想问题”，《解放日报》原拟发表社论，“一论”并“再论”“克服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普选的倾向”，但市委宣传部认为这样的题目不妥，指示报社“应从积极的正面来提”，“希望能多介绍一些典型人物，以活的榜样启发群众，教育群众”<sup>23</sup>。大量见诸报端的“主人翁”便应运而生。

除此而外，节庆仪式的环境烘托也是领导层十分重视的。普选运动中两个关键节点是由两个仪式凸显出来的：一是选民榜张榜和领取选民证；一是人民代表的选举大会。市政府领导和选委会对此作了精心部署，要求基层各单位根据庄严、隆重但不铺张的精神，在选举的重要场合“作某些必要的环境布置和较集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并配以“各种形象化和文娱宣传工具”，营造出一种庆典仪式的氛围，以增加人民“当家作主的光荣感和责任感”<sup>24</sup>。

上海基层选区闻风而动。各个选民登记站和选举大会会场张灯结彩，悬挂横幅，张贴标语，显示了一派盛大节日的景象。选举大会前后，市区主要街道的商店橱窗布置了普选的内容，马路两边人行道上举办了有关普选的照片和黑板报展览。各电影院、剧场、文化宫、公园都作了相应的环境布置，电影院在放映电影前加映普选宣传幻灯，剧场安排了普选短剧的演出。<sup>25</sup>

在身临其境的现场感中，底层大众的主人翁想象被极大地激发出来。选民们穿

---

<sup>23</sup>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致解放日报社编辑委员会，沪委宣（53）字，第1167号，1953年7月9日。上档 B52-2-32。

<sup>24</sup> 潘汉年：“普选宣传工作讲话提纲”（初稿），1953年10月13日。上档 B52-1-24。

<sup>25</sup> 市选委会：“卢湾区选委会关于选举大会前后宣传工作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1954年1月14日。上档 B52-1-23。

上新衣，许多妇女还穿上了绣花鞋；还有不少回民“按照他们参加隆重节日的习俗，洗了澡，穿了他们清洁的衣服，戴了平日不肯轻易戴的小白帽子参加投票”<sup>26</sup>。记者采集的那些“当家作主”的故事，几乎都融入了这些场景触发的“从奴隶到主人”的翻身情感。



<sup>26</sup> 黄浦区选委会：“刘秘书长在本区第 19 选区的‘选举动员’报告稿”。

与“当家作主”的宣传教育相呼应的是自上而下的组织网络监控。派至全市816个选区、164,374个选民小组的选举工作队员有9,929人，就地动员进行人口调查登记干部有24,966人。这支庞大的工作队伍随时向各区选委会报告基层选举动向。各区选委会干部又将各种信息归类上报，经市选委会集中处理后，编成简报下发，供基层及时掌握动向，或加以宣传，或加以规劝。各选区成立了党内的临时工作委员会，作为领导选举的核心。<sup>27</sup>各区还不时收到来自选区工作队发现破坏选举的情况报告，这些人被送上普选人民法庭或公审大会，成为反面教员。

在强大的宣传攻势和强力的组织监控之下，底层选民中的消极言论迅速沉寂，许多选区都传出了“联合提名、等额选举就是好”的声音。

如，“我们自己的党，自己的政府，领导老百姓翻身，当家作主，绝不会作（应为“捉”——引者注）弄我们的，笃定泰山好了”；“党为我侬（上海话，意为“我们”——引者注）斗争了30多年，现在又为我侬提名，又有啥不正确，不民主呢？”“毛主席提出来的办法意思很深，主要的是为了巩固我们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为了统一战线，否则如果全部选了工人，就变成工人大会，假使全是老板，那不就会造反了吗？”<sup>28</sup>

又如，联合提名的办法“可以解决‘人多，互相不熟悉，不晓得选谁’的困难，可以避免‘盲目选举’”，“替我们解决了选举对象”；“假使从下面提了很多人出来，结果就像箩里拣花，还是上面提名再让大家讨论好”；“共产党为我们拣了四个最好的大白梨（候选人），我们当然欢迎”；“要我们自己提名怎么提法呢？就是本里弄的人，又是看他工作倒很积极，但他的历史到底怎样我们又知道了，领导上是全掌握的”，“党像是站在国际饭店顶上看跑马厅，看得很清楚”。<sup>29</sup>

再如，“上面挑三挑四挑出来的总归好的，何必还要多两个再来挑，这种做法反而叫我们麻烦”，而差额选举就“譬如你需要买五只橘子，你已经拣了最好的五只，

---

<sup>27</sup> 中共上海市委报华东局和中央：“上海市基层选举工作总结”，1954年8月12日。上档A38-2-9。

<sup>28</sup> 市选委会：“关于群众对联合提名的反映情况的材料”。上档B52-2-12。长宁区选委会：“选民小组讨论中对联合提名、等额选举及对初步候选人名单拥护的反映”，1954年1月8日。B52-2-29。

<sup>29</sup> 市选委会：“关于群众对联合提名的反映情况的材料”。上档B52-2-12。杨浦区选委会：候选人事迹材料，1954年1月8日；长宁区选委会：“选民小组讨论中对联合提名、等额选举及对初步候选人名单拥护的反映”，1954年1月8日。B52-2-29。

如果再把不及它的几只也放上去，不是形式主义吗？”<sup>30</sup>

尽管无法断言这些赞美之词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底层选民的真实心态，但可以肯定这就是中共所需要的主人翁的表现。因为他们所表达的不是对个体权利的捍卫和自信，而是把自己的权利托付给了他们所信赖的领袖、党和政府。这些底层百姓只是在热热闹闹的喜庆仪式中，扮演了一次主角，体验了一下当家作主的欢愉。

就是在这选举的高潮中，全市 96.53%的选民走进了“当家作主”的情境，投下



了“庄严的一票”<sup>31</sup>。虽然无法知道这 687 万多选民中有多少种投票心态，但这样一个空前盛况正是为“国家主人翁”的话语策略作了成功的注脚。

更为成功的是普选的“压轴戏”——4,613 名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产生。在全市当选的代表中，工人（包括店员、机关工作者）占 49.99%，农民、独立劳动者、职工家属等劳动人民占 21.55%；中共党员占 37.55%，团员占 8.36%。市区代表中的工人比例更高一些，占 57.27%。<sup>32</sup> 1954 年 2 月 19 日，《解放日报》头版刊登新闻，宣告

<sup>30</sup> 市选委会：“关于群众对联合提名的反映情况的材料”。上档 B52-2-12。

<sup>31</sup> “上海市基层选举工作总结”。

<sup>32</sup> “上海市基层选举工作总结”。

“上海市基层选举胜利完成”。这则新闻列举了 23 位人民代表中的“优秀人物”，排在前列的是以全国劳动模范、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副厂长陆阿狗领衔的工人农民中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国棉十七厂青年女工、1953 年全国劳动模范黄宝妹，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戴可都、裔式娟，在生产上有着 10 多种创造发明和改进、为国家节约了 11 亿财富的全国劳动模范范东科，由于改进发电机使增加电量相等于供给一所 5 万锭纺织厂用电量的上海电力公司工程师吴作泉，安全行驶并得到车辆不抛锚特别奖的公共交通公司工人刘宝山，跟资本家不法行为作坚决斗争并被评为上海市店员劳动模范的董连元以及华东区丰产模范沈油民，上海市农业劳动模范、新泾区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顾小弟。

这个代表构成不仅与“国家主人翁”的阶级面貌完全吻合，而且他们的“先进事迹”又使得“主人翁”形象更加高大，更加完美。

当选代表陆阿狗是《解放日报》记者采访报道的最热点人物。还在提名推选正式候选人阶段，一篇报道就通过一位选民小组长、里弄妇女委员俞士瑞的普选经验，把他塑造成选民心目中当然的代表，崇拜的偶像。选民小组会前，这位俞大姐“想来想去，最后想定了一个人”：一定要在小组会上提名陆阿狗当代表候选人。“因为他是著名的全国劳模，对国家有很多贡献，选他当人民代表，一定可以为人民办好事”。在陆阿狗与选民见面的那天，“俞大姐比平日来得更高兴，晚饭提早吃好后，便同另一个选民小组长一齐到会去”。一进会场，“俞大姐的两只眼睛东张西望地在寻找陆阿狗”。会后，她“逢人便说，‘我今天看见了劳动模范陆阿狗了’”<sup>33</sup>。对陆阿狗所在选区选举大会的报道更是图文并茂，有“陆阿狗小组”组长应忠发代表全组选民表达的决心：以“开展劳动竞赛，超额完成任务”的“实际行动支持和拥护我们的代表”；有该小组青年女工邹全英表达对陆师傅手把手的指导和帮助的感激之情；有陆阿狗本人满怀豪情的一番“当选感言”：“由于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人民翻身掌握了政权，今天我才会被选为人民代表。为了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美好理想，我一定要搞好业务，做好工作”。<sup>34</sup> 这些文字的表达在摄影记者的镜头里便浓缩为一个众星捧月的瞬间<sup>35</sup>。

---

<sup>33</sup> “见面”，《解放日报》1954 年 1 月 7 日。

<sup>34</sup> “代表和选民”，《解放日报》1954 年 1 月 19 日。

<sup>35</sup> 《解放日报》，1954 年 1 月 18 日。



名不见经传的底层“劳动人民”跻身人民代表行列是宣传报道的另一个重点。《解放日报》的连续几篇报道都是在“谁是最满意和必要的候选人”的热烈争论中，推介那些平凡人物的事迹。

在江宁区第 25 选区，初步候选人、三轮车工人郭正发得到的好评是：“工作很积极，经常踏了三轮车回来还要做里弄工作，有时候工作忙，他宁愿家里吃的苦一些，少踏一班车子，也非要把工作做完不可”。被选民们认为比郭正发更胜一筹的莫龙英获得的赞扬是：“一个年轻的家庭妇女，什么工作都肯干，立场又稳，镇压反革命分子时她不顾情面检举了反革命亲戚；弄堂里不论老少，大小事情都喜欢找她商量”<sup>36</sup>。

在虹口区第 12 选区，许多选民认为“一定会被选出来”初步候选人、里弄妇女委员会副主任吴佩珍的优秀表现是“爬梯刷墙、下地挖阴沟，发动群众打预防针、种牛痘，总是自己带头，积极推动”；“还有付房租，储蓄，收款缴银行，发收据，贴奖券，只要便利居民，她说做就做”；“从前做调解工作时，半夜起来给人家调解

---

<sup>36</sup> 《解放日报》1954 年 1 月 9 日。

纠纷”。另一位也很有人气的里弄治保委员张冰心获得支持的理由是：“家里有5个孩子，可是逢年过节，自己不出去玩，领导大家做纠察工作”；“经常把所了解的情况向上汇报，对治安保卫工作很负责”；“立场稳，也积极”。<sup>37</sup>

在普陀区第28选区，候选人吴阿宝被许多选民称为“心中喜欢的人”：“已经49岁的人了，头发落了，身体又不好，还一天到晚忙生活（上海话，意为“工作”——引者注）。当美国强盗用尽心思想再到中国来杀人放火的辰光（上海话，意为“时候”——引者注），她叫三房合一子的儿子去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儿子上了前线，她还写信叫她儿子好好抗美援朝，保卫住和平的日子，保卫住人民的政权”。19岁的居委会干部吴小妹也大受褒扬：“人虽小也不容易啊！去年飓风来的时候，她半夜摇铃把大家喊起来，帮助棚户居民做好防御工作”。<sup>38</sup>

类似的候选人也在各种内部的通报上频频亮相。来自里弄的情况反映，几乎所有的选民小组讨论里弄干部候选人的时候，都会有人不约而同地说，若不是联合提名，他们怎么可能选上！有的居民形象地说：“角角落落里的人也被共产党提出来了，真深入”<sup>39</sup>。不少候选人受到居民的称赞，有的选民说，“像这样的候选人，工作积极，落雨落的嗒嗒滴（上海话，意为雨下得很大——引者注），还是一样出来喊开会，不选她选谁？”也有的说：像这样的居委会主任，“连3岁小孩子都说他好”，“我们里弄只有他一人见过毛主席，别说区里见过毛主席的人少，全市也不多”。还有的说，像这样担任居委会主任的三轮车工人，“经过居委会门口时，将车子放下还进来扫扫地，倒痰盂，凭良心讲，我们这些里弄干部哪个像他一样，他的优点是说也说不完的”，“他当代表候选人是全体（里弄）干部的光荣”。<sup>40</sup>

无论是众人仰视的劳动模范的英雄业绩，还是百姓身边平凡琐碎的好人好事，一经作为“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的话语建构，就有了共同的面貌与特征：一是忠实为国家服务，立足本职，以“主人翁精神”积极贯彻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二是带头响应国家一切号召，积极投身各种政治运动；三是全心全意为身边群众做好事，堪称道德楷模。至于人民代表如何行使参政权、投票权，如何讨论国家大事，如何

---

<sup>37</sup> “认真挑选再挑选”，《解放日报》1954年1月12日。

<sup>38</sup> “民主花儿朵朵开”，《解放日报》1954年1月9日。

<sup>39</sup> 长宁区选委会：“选民小组讨论中对联合提名、等额选举及对初步候选人名单拥护的反映”。B52-2-29。

<sup>40</sup> 普陀区选委会：“第9选区劳动人民代表候选人于顺德同志事迹”1954年1月9日；郊区选委会办公室：“群众对联合提名、等额选举一些好的反映”，1954年1月7日；提篮桥区选委会：“33选区群众认真讨论代表候选人”，1954年1月12日。上档 B52-2-29。



真实反映底层群众的呼声和诉求，并代表他们与政府交涉等等，这些本属于人民代表最基本的履职行动，在这些代表事迹中几乎不见。各种媒体所呈现的，仍是以劳动模范为典型的一批榜样，起码也是底层社会的好人，是勤恳的为民服务者，而非忠实的代言人。

与选民们一样，人民代表也是生活在“国家主人翁”的感觉世界里。

## 京城：真实主人翁

在感觉世界之外，政治与社会场域内还是有国家主人翁真实地存在着，首都北京便是其集中之地。

作为普选的发动者和掌控者，身居京城的毛泽东和中共高层领导的国家主人翁地位毋庸置疑。而就在他们身边的中央和北京市机关干部中，却有一些人以非主人翁的态度，表现出“当然主人”的傲慢与偏见。

一份来自北京市选委会的报告写道：居住在西单区选举试点地区的一些机关干部“表现得相当不好”，“这些机关大多是中央一级的”。报告举例说，全国总工会的人事处长将选民登记工作人员拒之门外，称“我们很忙，这样来找我们还得了！”；“全总宿舍住着很多干部，却选了一个保姆做选民小组长，保姆找干部开会，他们不理”；“选民登记时，轻工业部造纸管理局马马虎虎，15个选民，就漏登记了7个”；“更糟糕的是，居住在这机关附近的选民，借他们的灯光开选民小组会，该机关的警卫员立即把灯灭掉，此事引起群众极大不满，说：‘选举是三大任务中的一个，知道不知道？’‘你们是人民的老爷’”。报告反映：“机关干部不积极参加有关普选的各种会议相当普遍，理由是‘工作忙，没有空’。并认为‘选不选，与我关系不大’。有些是不愿和一般街道居民一齐开会，觉得‘有失身份’”。<sup>41</sup>

对此，北京市委非常重视，认为这些对普选“极不关心”的干部“影响很坏”。因为“城市基层选举也需要干部起骨干作用，否则主要得依靠无业、半无业的街道

---

<sup>41</sup> 北京市选委会报告，1953年7月25日。北京市档案馆（以下简称：“北档”）1-6-814。

积极分子”。<sup>42</sup>

尽管北京市委采取了很多措施，便利机关干部参加选举活动，但情况并未有太大好转。距上述报告三个月后，北京市普选全面展开。一份内参再次向领导汇报西单区部分中央及北京市级机关干部“不积极参加普选”之“比较普遍”的情况。内参上列名的有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个附属机构、政务院的4个宿舍、中央公安部宿舍、防空政治部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所列举事实与试点时的报告大致相同，致使“工作组感到联系困难，推不动”。<sup>43</sup>

这些围绕中南海而居的干部们，也是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国家主人翁”的另一层意义：这是一群特殊的选民，是凌驾于百姓之上的主人。他们入住首都不过4年，但似乎已经预示着日后“国家主人翁”的一个真实的面相。

与机关干部的上述表现相左的极端一例，是北京大学一批知识精英“主人翁”的激进行动。

事由张东荪的选举权而起。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张东荪被指控泄露国家机密接受审查，后获“宽大处理”，保留政府委员薪金，发回北大哲学系“改造”。普选开始时，张“认为自己没有宣布（被）管制”，“决定去参加选民登记”并被列入选民榜<sup>44</sup>。

张东荪上榜一事在北大引起轩然大波。北京市委办公厅发至市委委员的《普选情况》第7期专门汇集了北大对张东荪选举权的反应<sup>45</sup>。这份绝密文件写道：

“张东荪的名字被列入选民榜后，北大教授议论纷纷，表示不满。周××（进步）、熊××（中左）问：‘我早已控告他了，怎么还有他的名字？’张××（进步）要求政府对张进行侦审。冯××要求开除张工会及中国哲学会会籍，并撤销其教授职位。汤××也表示不满。吴××（中间）骂选举工作组‘不解决问题！’向××（中间）说：‘别人有他犯的一件罪行，早就劳动改造去了，如果我泄露志愿军出国秘密，怕早已魂归天外了。’个别教授以为‘这是毛主席决定的’，‘真是宽大。’吴××（中左）说：‘谣传张曾写信给中央，是中央特许的。’选民小组开会时，教授们都非常气愤，骂张‘竟想混进我们的队伍！’‘恬不知耻！’一致提出要‘分清敌我’，‘剥夺张东荪的选举权！’有些中间教授并检讨了自己对张的选举权曾抱自由主义态度是

<sup>42</sup> 北京市普选工作典型试验总结（草稿），1953年9月。北档1-6-814。

<sup>43</sup> 北京市选委会：“选举工作简报”（仅供领导同志参考）第25号，1953年10月22日。北档14-2-24。

<sup>44</sup> 北京市委高校党委整理：“有关张东荪的一些最近情况”（绝密，发市委委员），1954年1月18日。北档1-6-1032。

<sup>45</sup> 1954年1月4日。北档1-6-821。

‘思想麻痹’，‘缺乏当家作主精神。’只有贺×（曾被管制）表示‘事实如此，非常痛心’，但立即遭到驳斥。现已有二十多教员向选举工作组控告张的罪行。”

1954年1月6日，北京海淀区选委会召开全体委员会，受理要求剥夺张东荪选举权的检举案件。冯××、高××、吴××等10余人代表北大80余名检举人出席控诉。张东荪由其妻陪同到场，“情绪紧张，手有些抖”。为了避免双方对质造成紧张局面，在会议进行半小时后，“宣布休会，令张暂退场”。在所有检举人代表控诉完毕离去后，张再进场交代，称“群众所提的基本上是事实”，表示：“既然群众是这样，我也只能听从群众的意见”。<sup>46</sup>会后，张东荪对人说：“北大的人骂的很厉害”，“实在要剥夺选举权，也没有法子”<sup>47</sup>。

---

<sup>46</sup> 北京市委高校党委整理：“海淀区选举委员会受理检举张东荪案简况”（发市委委员），1954年1月6日。北档1-6-1032。

<sup>47</sup> “有关张东荪的一些最近情况”。

虽然目前尚未有材料记载张东荪选举权风波最终如何结局<sup>48</sup>，但北大教授们的主人翁姿态已经展示得淋漓尽致。他们遵循毛泽东“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的指示<sup>49</sup>，做到了各级组织反复要求的用“实际行动”捍卫庄严的政治权利。尽管他们自己还是被划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刚刚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洗了澡”，但这一行动确实是给党和政府帮了忙而不是添了乱，至少也是应了鲁迅当年对京派的特写：“官的帮闲”。北大哲学系讲师周礼全说得很透彻：“共产党真是马列主义，张东荪名字一上榜就可以达到三个目的：第一，按法律办事，一丝不苟；第二，群众一定会检举，划清敌我界限，教育了群众；第三，重新提出张的问题，可以藉此大搞一下。”<sup>50</sup>

如果说，北大的教授们是以精英立场来“当家作主”的话，那么，西四区旃檀寺南选区的天主教选民就是以底层立场去争当“主人翁”的。

北京市西四区是天主教徒较集中的区域。全区有天主教堂6处，无单位的居民中就有天主教徒9,200余人。<sup>51</sup> 旃檀寺南选区是天主教北堂及若瑟总院所在地，那里有教徒选民1,015人，占整个选区5,535个选民的近20%。<sup>52</sup> 中共西四区委内定从全区天主教徒中产生人民代表两名，作为“中间分子”或“落后分子”的政治代表。<sup>53</sup>

普选进入候选人提名阶段，区委发现，部分教徒对各党派协商联合提名的天主教革新委员会负责人贾振民有很多非议，北堂的神甫、修女及居民中少数教徒“反映较大”，说他当上候选人是“工作组包办”，是“政府已内定”的；说他“不能代表传教士，不能代表宗教界”。有的教徒表示“如果贾振民做代表候选人，我们就不投票”。还有的教徒向工作组举报了贾振民和革新会的许多不良甚至是非法行为。住在该选区的政务院中央文委宗教事务处第1组的干部程某“以个人名义”到选举工作组反映情况并提出“个人意见”说：“贾振民作为南选区的代表不合适，工作积极

---

<sup>48</sup> 据蓝公武（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私下透露：“张的选举权问题，市选举委员会无权决定，要更高级才能决定”。见，“有关张东荪的一些最近情况”。

<sup>49</sup>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5页。

<sup>50</sup> “海淀区选举委员会受理检举张东荪案简况”。

<sup>51</sup> 中共北京市西四区委：“西四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各方面比例及代表候选人提名问题的初步意见”（草稿），1953年12月18日。北档1-6-825。

<sup>52</sup> 中共北京市西四区委：“西四区旃檀寺南选区天主教在代表候选人提名阶段活动情况及处理意见报告”，1954年1月18日。北档1-6-825。

<sup>53</sup> “西四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各方面比例及代表候选人提名问题的初步意见”（草稿）。

是真的，但没有代表性，贾不是虔诚的教徒，因此他就没有代表教徒的资格。”“贾振民做（革新会）主任既不是上边派的，也不是群众选出的，他是自封的。（贾）要当代表起码有 90%以上的教徒不同意”。<sup>54</sup>

这一选区许多天主教徒想推北堂副主教李君武当代表，为其拉选票而游说及串连活动在私下里紧张进行。北堂神甫胡某带着讥讽的口吻，对政府认定的“积极分子”、选民小组长、教徒张某说：“你真好，卖国求荣，我听教徒反映你不选李副主教，（你）把贾振民选上是什么思想，别忘了你是天主教友，李君武是咱们主教，你不但不起作用，相反还不选他”，又说：“你姑姑是修女，咱们天主教也应出一代表，为这出点力比什么不好呢？”北堂另一位神甫姚某到街道积极分子、党派协商候选人时曾有提名的教徒吕某家中鼓动说：“李君武是传教士，是教内最高负责人，不但在北京，就是在华北也都知道他，为什么不选他？！”在教徒比较集中的库东夹道，部分担任选民小组长的教徒还经常去北堂向神甫报告情况。<sup>55</sup>

抑贾抬李的声音也很响。比如：对贾振民的候选人情况介绍夸大了其功劳，“把李君武的工作都说成贾振民了”；“亚洲太平洋会议（贾）根本没有做什么工作，主要是李君武做的”，“他只是招待并作了些保卫工作”，“只是开开汽车门，开开窗户，拱拱（意为“驱赶”——引者注）叫花子”；“和平签名是神甫帮他做的，要不贾振民不能有这样大的成绩”等等，并要求“工作组调查”。<sup>56</sup>

教徒们活动的结果，未经联合提名的北堂副主教李君武获得正式候选人提名 349 票，另一名神甫王汝辑得到 141 票提名<sup>57</sup>。

天主教徒原本就是区委密切关注的“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选举中这些明理暗里的行为更引起西四区委的高度警觉，他们认为“这些活动主要是为了争取教内神职人员代表名额而有计划地进行”。区委研究后采取应对措施两项：其一，在估计贾振民当选“没有什么问题”和正式候选人已经公布的情况下，不能再增加宗教代表名额。“为了争取教徒及神甫、修女参选投票而不进行破坏活动，请市委把此情况转宗教事务处，通过该处对李君武等人进行工作”；其二，“工作组通过选民小组

---

<sup>54</sup> 中共北京市西四区委：“西四区旃檀寺南选区教徒的一些情况”，1954年1月18日。北档 1-6-825；“西四区旃檀寺南选区天主教在代表候选人提名阶段活动情况及处理意见报告”。

<sup>55</sup> “西四区旃檀寺南选区教徒的一些情况”；“西四区旃檀寺南选区天主教在代表候选人提名阶段活动情况及处理意见报告”。

<sup>56</sup> “西四区旃檀寺南选区教徒的一些情况”；“西四区旃檀寺南选区天主教在代表候选人提名阶段活动情况及处理意见报告”。

<sup>57</sup> “西四区旃檀寺南选区天主教在代表候选人提名阶段活动情况及处理意见报告”。

长宣传人民的民主权利，投票时注意哪些问题，什么叫破坏选举的行为，教育群众尊重自己的权利，干涉选民自由选举自己认为满意的人是违法的”。<sup>58</sup>

西四区委的措施并没有多大奏效，带有政治压力和警示性的谈话以及宣传导向没有降低李君武的支持率。1954年1月28日，北京市委办公厅的《普选情况》第15号汇总了全市正式选举的基本情况：各区正式候选人“全部当选，选票集中，一般都是百分之八、九十以上，最高的达99%，最少的也在70%左右”。而非正式选举人中“以西四区天主教李君武得票最多（300多票）。”<sup>59</sup>在等额选举规则和高得票率的压倒优势下，李君武所得的这300多票看似微不足道，然而，这却是300多位选民用头而不是用脚投的票，也是法理意义上的“主人翁”投的票。

如上所述，京城的官、学、民各自代表了“国家主人翁”的一个面相。尽管他们是在不同的意义和价值上体现当家作主，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主人翁”形象也迥然不同甚至全然相悖，但是，共和国的历史发展已经或正在证明，他们所表现的主人翁是真实的存在。

## 余论：谁是主人翁

在讨论了感觉世界的主人翁和政治社会空间的主人翁之后，笔者想延伸探讨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形象的图谱内，上海与北京到底哪一个城市堪称主人翁？

之所以如此设问，还是起于对第一次普选中京、沪两地不同政治文化的好奇与思索。

普选中上海的底层社会也不乏与国家较量的例子，与北京最具可比性的是上海天主教徒的表现。类似于西四区天主教徒对联合提名候选人的阻抗也在上海天主教徒集中的选区出现。1953年11月23日上海普选全面展开之初，市选委会在《普选情况》第1期中就已提醒“对天主教徒要注意”：他们“对我们提出的其他候选人，意见并不多，一提到天主教徒中靠拢我们的，在他们所谓‘叛徒’，则大肆攻击”<sup>60</sup>。

至于上海的天主教徒是否做出像北京那样游说串连的群体性举动，是否推举了

---

<sup>58</sup> “西四区旃檀寺南选区天主教在代表候选人提名阶段活动情况及处理意见报告”。

<sup>59</sup> 北档 1-6-821。

<sup>60</sup> 上档 B52-1-40。

比李君武更有影响力的人物龚品梅，因材料的缺乏尚不能确定<sup>61</sup>。但从选举结果看，上海非正式提名选举人中，肯定没有天主教徒名列得票的榜首。

而饶有意味的是，上海选举中出现了另一种被领导机关指认的“偏差”：“不少区里，群众对劳动人民的代表提了不少意见，对资产阶级的代表反而意见不多，甚至在介绍候选人事迹时，对党员负责同志介绍不力，对资产阶级反错误地夸大了功劳；有的选区，资产阶级得票多于区级党员负责人。申新九厂资方代理人吴士槐，解放前直接勾结警备司令部镇压工人，协商通过后，工人反映：‘想想「二二」事件，恨不得吃他的肉，想想总路线，可以投他一票。’区选举委员会只是考虑该厂的代表性，让他当选为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们（指市选委会——引者注）也没有坚决加以纠正。”<sup>62</sup>

虽然上海市委在上报华东局和中央的“上海市基层选举工作总结”中承担了发生“偏差”的责任，认为“这是对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中可能发生的片面性缺乏足够估计”所致<sup>63</sup>，但这只是上层政治一种例行的格式化的交代。潜藏于上海社会政治文化中的资产阶级情结，才是这种“偏差”表象下的深层动力。只不过，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上海社会与国家的抗衡，通常是软性的、无组织的集体意识和历史记忆的再现，而不像北京那样的硬性的有组织的群体行动。

由此便不难想见，为什么身为中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发祥地的上海，却往往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翁形象的代表。

而普选中北京那些真实的主人翁面相，不管是被视为“自己人”的，还是可利用的；不管是受保护的，还是加以压制的，都是京城的强势政治文化熏陶、培育和感染的结果。因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翁在北京，在中南海。

当然，京沪之间的政治文化关系远不是“谁是主人翁”的探究所能概括的。这里提供两则第一次普选中领袖人物投票的历史文献以结束全文，并希望为京沪政治文化之比较留下更多的讨论空间。

北京市选委会《选举工作简报》记载：1953年12月6日，北京西单区举行人民代表投票选举。“中央各部门首长，都亲自到站投票，张友渔副市长晨8时即到投票站；班禅驻京办事处、民族学院附中等处的选民都穿上鲜艳的民族服装去投票”。

---

<sup>61</sup> 因涉及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案的材料均属高密级的不开放档案，普选中的有关情况因此而不可知。

<sup>62</sup> “上海市基层选举工作总结”。

<sup>63</sup> “上海市基层选举工作总结”。

而同属西单区的“中南海选区订于 10 日举行选举”<sup>64</sup>。翌年 1 月 18 日，北京市委宣传部向基层各选区发出通知，要求全市各电影院在 19 至 24 日各区投票期间“放映西单选举时毛主席投票等的新闻记录片。影片由华北影片经理公司供给”<sup>65</sup>。

1954 年 1 月 28 日，《解放日报》头版醒目位置刊登来自上海市新闻处的消息，大字标题是“参加上海基层选举 宋庆龄陈毅谭震林等投票”。文中说：“现住在上海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参加了静安区第 19 选区的选举大会，进行投票”。这则消息的上方，刊有宋、陈、谭投票的大幅照片。据上海档案记载，静安区第 19 选区位于上海市延安路、华山路、常熟路一带，宋庆龄旗下的中国福利会于该选区内。这一选区选出区人民代表 8 名，其中，工人、医生、教师，居委会主任各 1 名，机关干部及工商业者各两名。<sup>66</sup>



<sup>64</sup> 北档 14-2-24。

<sup>65</sup> 北档 1-12-127。

<sup>66</sup> 上档 B52-2-108。